康乾盛世浅议

高　翔

对十八世纪中国来说，最重要而影响又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康乾盛世的全面形成，以及发生于乾嘉之交的盛衰巨变。虽然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无论从研究深度和广度看，都还大有发展余地。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从其酝酿、出现以至消失，都具有一定阶段性，社会演变也是如此。清朝康乾盛世，前后持续百余年，在不同时期繁荣程度不同，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不尽一致，为此，笔者对其演变过程作以粗略分期：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到六十一年，雍正继位，为盛世形成时期；从雍正元年到乾隆二十四统一新疆，为盛世的发展时期；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四十五年甘肃回民事变前夕，为清朝全盛、鼎盛或极盛时期；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嘉庆元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暴发，是由盛转衰时期。嘉庆元年以后，各种矛盾激化，清朝彻底结束以往的繁荣，进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

考察任何一个时代的特点，有必要将它置于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予以比较分析。如果把康乾时期和其他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故谓之“全盛”、“极盛”，它是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十八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社会及文化本身也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对康乾盛世的繁荣状况，人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潮等多方面予以考察。然而，康乾盛世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还是政治上的，这就是“大一统”局面的完全形成。

“大一统”，语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秦汉以后，“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家们潜心追求的重要政治理想，奉之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大一统”包含三个基本要求，一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二是国家统一，“书同文，车同轨”，“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3)三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即“天下归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反观历史可以发现，自秦汉到清初的两千年中，几乎没有哪一朝能很好完成“大一统”的上述三个要求，即号称盛世的汉唐时代，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地方割据等弊政仍层出不穷，严重危害封建政治的正常运行，明朝以文化专制和理学兴盛著称，但仍有何心隐、李贽等异端思想家出现，“敢倡乱道，惑世诬民”。(5)国家统一更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从秦末汉初匈奴单于冒顿一统漠北后，北方蒙古高原就出现相对统一的游牧政权和军事力量，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府相抗衡。游牧民族往往凭借其军事优势，不断南下，攻掠骚扰，危胁汉族百姓的生产生活。自汉代以后，上述情况史不绝书。及至明朝，又不得修长城以御蒙古。清朝和以前各朝不同，统治者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具有极为鲜明而坚定的立场，那就是通过君主“乾纲独断”，实现权力的集中与国家的统一。我们看到：在康雍乾时代，权臣、外戚、宦官、朋党、藩镇等传统政治常见的弊端均予消除，尤其是密折的运用，军机处的设立，使皇帝的意志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贯彻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而教化的推行，文字狱的迭兴，更使意识形态出现前所未有的“一体化”现象：有影响的异端思想家不再产生，即使产生，其思想也得不到传播，

整个士人队伍，几乎无一例外地束缚于儒家纲常伦理之中。最重要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康乾时期得到空前加强，历朝未能很好解决的蒙古、西藏、新疆问题在这个时期均予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牢固地置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时人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6)总之，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全面完成了儒家“大一统”政治目标，“合六合成大一统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即是对当时“中外一体”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7)

尽管康乾盛世在繁荣程度上远逾历代，但它毕竟衰落了，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是什么？气派恢弘

和任何具体和生物体一样，社会的发展也受其内部机制，尤其是发展潜力的制约。康乾盛世是气派恢弘、成就突出的，但如果透过繁荣的表层即可发现：在全盛形成过程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清朝社会正面临严重的发展潜力不足：

首先，传统政治缺乏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动力。清朝以前，在“大一统”政治目标刺激下，中国政治演变存在两个显著趋势：一是君权强化趋势，二是官僚政治的严密化趋势。进入清朝，经康、雍、乾三帝不懈努力，到乾隆中叶，“大一统”局面形成，专制皇权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官僚政治严密到无法更加严密的程度，“纪纲整肃”，乾隆称：“（本朝）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8)这种情形诚然标志着传统政治已经臻于理想境界，但同时也意味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既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传统政治已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和动力，现存政治机制随之进入衰老解体时期，乾隆后期无法阻止的腐败，即其明证。从清廷决策集团来看，统一新疆后，随着“全盛”形势的到来，统治者显示出统治智力的严重不足，专制皇帝不但丧失了初年开拓进取蓬勃向前的朝气，更重要的是，他已找不到一种新的办法将清朝的繁荣推向新的高度，故只好实行“持盈保泰”，持、保都是维持的意思，显然这是以维持现状为目标的保守统治策略。在历史上，通过默守陈规长期维持繁荣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向社会成员指出新的奋斗目标，才能刺激繁荣的深入与发展。皇帝是传统政治的集中体现，他统治才智的枯竭，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政治体制及其管理模式的没落与过时。

其次，清朝社会经济正面临着新的危机，那就是人多地少，粮食生产严重不足。区域性人口过剩在康熙晚年即已出现，到乾隆前期发展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全局性问题，”不但汉民生齿日众，即苗民丁口亦渐蕃庶，所种山土不能宽然有余”。(9)土地资源已被利用殆尽，无荒可垦，粮价上涨，时人称“康熙年间，稻款登场时，每担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盖户口多，则需款亦多，虽数十年间，荒土未尝不加辟，然至今日（乾隆十三年）而无可垦之荒矣”。(10)尤其是乾隆晚年。“产之者寡，食之者众”，“日食不继，盖形拮据”，(11)众多百姓饥寒交迫，不少人挺而走险，粮食问题逐渐转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较深层次看，清朝以人多地少，粮食紧张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意味着传统生产方式已经不能解决由自己内部产生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历史发展要求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对物质资源进行更加有效的开发与利用，对社会财富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与占有。

第三是士风的保守与落后，士人是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其价值取向，精神面貌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以考据学为特征的乾嘉士人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它对传统思想文化而言，是集大成的，但却不是开创性的，它系统整理了古

代学术及历史文献，但对清朝社会未来发展却没有指出一条明确而富新意的道路。事实上，不但乾嘉之世，即整个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士人阶层，也大多笼罩于一种封闭保守的学术气氛中，人们很少吸收新的思想，也无意于提出新的思想，对古代圣贤学问的推崇与在思想上力图回归古代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时代特征。少数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也纷纷站在古人的立场上评论现实，象陆生楠反对君主专制，却主张恢复封建制，认为“封建之制，古圣人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且有“东南之人多希翼封建”等无稽之谈。(12)在涉及到中外文化交流上，这种保守倾向就表现为自我中心夜郎自大。象李光地本系著名理学家，在接受传教士带来的地圆学说后，却引经据典，认为中国早已有之，否认西学的先进意义。(13)当然，康乾之世也有一些学者，在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后，冷静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在当时浓郁的保守气氛中，这些观点并未流行，也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康乾盛世的衰落和其繁荣一样，具有客观必然性。尤其值得人们充分注意的是：清朝以前，中国社会也曾多次也现过强盛之世，尽管它们在繁荣程度远不及康乾，但因传统社会内部还具有较强的活力，故一个时代衰落之后，新的繁荣时代又逐渐产生，历史正是在人世代谢、盛衰隆替中缓缓向前。清朝情况不同，它的繁荣是空前的，但也是绝后的，传统的政治管理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其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之后，已明显暴露出时代局限性，而被历史发展所淘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创造出自己最辉煌灿烂的瞬间之后，已经别无选择地走向没落：全盛只有一个，而且不复再来。

如果把康乾盛世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即会发现：当清朝正处于繁荣的高峰，当人们正陶醉于盛世的文治武功时，产业革命在欧洲暴发，科技发明与社会变革不断产生，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分工，水力、机器的应用中被彻底摧毁。(14)至此，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完全拉开，近现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最终铸定。……这种历史落后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尤其是康乾盛世的悲剧意义所在。

---

(1)《前汉书》卷56〈董仲舒传〉。

(2)《论语·季氏》。

(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4)参阅《论语·颜渊》、《前汉书》卷56〈董仲舒传〉。

(5)《明神宗实录》卷369。

(6)《雍正起居注》7年6月，胶片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雍正实录》卷83。

(8)《乾隆御制文集》二集卷6。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3册第90页。

(10)《乾隆实录》卷113。

(11)《乾隆实录》卷1441。

(12)《雍正起居注》7年6月，胶片21。

(13)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6。

(14)参阅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